

中国近现代
高等教育研究
丛书



周川◎主编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 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 (1892-1947)

谢竹艳◎著

ZHONGGUO JINDAI JIDUJIAO DAXUE WAIJI
XIAOZHANG BANXUE HUODONG YANJI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周川◎主编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 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

(1892-1947)

谢竹艳◎著

ZHONGGUO JINDAI JIDUJIAO DAXUE WAIJI
XIAOZHANG BANXUE HUODONG YANJI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 1892~1947/谢竹艳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4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周川主编)
ISBN 978-7-5334-6703-6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基督教—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研究—中国—1892~1947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518 号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 (1892—1947)

周 川 主编

谢竹艳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4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703-6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序

周 川

—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下限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会转折期特有的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极的种种矛盾和乱象，例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当然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环境的艰险，反而映衬出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更显得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显得不同凡响。例如，为了维护大学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会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又如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颠沛流离，师生饥寒交迫。西南联大像梅贻琦、闻一多那样的名校长、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卖太太的女红或是代人刻章以维持生计。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师生们却

“同艰难、尽笳吹”，修业乐道，弦歌不辍。难怪李约瑟盛赞，那些为避战火而迁徙到深山里的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在李约瑟看来，如此艰难环境中办出如此成就的大学，不啻教育的奇迹！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艰难地孕育和发展。在那里，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而造成的乱象，也能看到应规蹈矩、循序渐进的井然有序；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到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和种种教育奇迹的涌现。

环境动荡艰险，道路曲折坎坷，内容丰富多彩，成败泾渭分明；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独特的历史遗产。这笔历史遗产，无论是“教育的奇迹”还是乱世的牺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意义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社会性状的真实缩影。然而，对这笔历史的遗产，我们显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认真系统地加以总结，因而对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所知甚少。今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外的种种“故事”和“掌故”，还有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故事多，轶闻多，说明了这段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流传的价值，最起码说明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来继承这笔历史遗产，也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笔历史遗产的珍贵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个特殊案例的真谛，以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不管我们是否正视它，也不管我们如何对待它，它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前进路标，是今人可以对照的一面明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弘扬优良传统、避免重蹈覆辙，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苏州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和

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组织相关方向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这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肯定无力承担系统总结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经验教训这样宏大的主题，它只是选择了这段历史中几个具体的点或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描绘路径，透视背景，分析因果，评价功过，论证意义。即便是这样，对于大多侧重于教育学背景的各位著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高难度目标。但是，我们坚信“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训，坚信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以勤补拙的态度，发扬钻研研微的精神，愿花大力气，肯下笨功夫，我们的这一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钝学累功的效果，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敢于不揣浅陋，将这套丛书奉献在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读者面前。

二

谢竹艳博士所著《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1892—1947）》，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的专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本书以近代中国 13 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 26 位校长为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梳理、归纳了这些外籍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业绩以及他们的人格特征，探讨了他们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外籍校长的一幅群像。

这幅群像的一个自然轮廓是：他们生长在 19 世纪中后期，都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其中有 23 位美国籍，并有 3 位女性；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出任校长之前都有在华传教、任教的经历；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博士学位者有 20 人；所学专业涉及文学、医学、理学、教育学、神学等门类；他们出任教会大学校长时的年龄，最年轻的只有 32 岁，最年长的已 64 岁；如此等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外籍校长的形象曾被我们描绘得非常的阴暗、狰狞，有如恶魔一般。如今时转世移，我们终于可以本着比较

客观的心态来重新认识这些外国人了。

最为国人所在乎的，是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这些外籍校长，尤其是那些“传一代”的校长，他们在初入这个古老的国度时，态度谈不上友好，言辞也多有不恭。卜舫济初入上海县城，“第一印象”就是“肮脏”、“恶心”，他甚至怀疑“人怎么能适合住在这种地方”；狄考文的感觉是，中国人还处在“半开化”状态。但是，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期之后，对中国的态度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变，最典型的莫过于顽固透顶的卜舫济，后来竟非常留恋这个“不是人住的地方”。至于那些“传二代”的外籍校长们，如司徒雷登、司徒华林、费佩德、香雅阁等，由于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自幼形成，当然也就非同一般。

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这些外籍校长在办学宗旨方面的转变。本书在这方面引用了丰富的资料，条分缕析，用功较深，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外籍校长在来华办学之初，多以传教为目的，旨在“培养中国人当基督教的传教士”，进而通过他们将中国人融入“基督教文明”之中。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的传教并不成功，最起码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实的困境，迫使他们放弃了传教的初衷，而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教育本身上来。包文“志在为中国兴教育”；孙乐文主张“即将在中国建立的新教育体制必须是属于中国的体制”，“新学”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而不应仍旧保持其舶来品的“异国情调”。这些言论，都可以看作是其办学宗旨转变的证明。

要了解这些外籍校长，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及其实际效果。本书提供的许多史料，记载了这些外籍校长的办学事迹，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毕启先后 15 次漂洋过海回美国，为华西协合大学筹款；卜舫济 1916 年回美休假，作了 116 场演讲，演讲募来的款项全部用于圣约翰大学购地；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不屈不挠游说各路军阀。又例如，狄考文 1879 年用自己的版税为登州书院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第一个车间实验室；裘德生 1886 年给杭州城里带来了第一台蒸汽机和其他电气设备；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大家庭；等等。本书认为，尽管这些校长“因各种因素影响，所获成就不一”，但他们“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和具备杰出能力的群体，他们领导基督教大

学走向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这样的结论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的，信不信由你了。

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按照大学办学活动的主要方面，从总体上概括了基督教教会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的共性特征，探讨了他们的办学理念 and 办学行为，归纳出这些外籍校长的群体特征，具有学术的价值和理论的意义。但是，这些外籍校长由于个人经历、具体环境的不同，他们的办学活动也有许多个别差异，这就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作更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研究，这也是笔者寄希望于作者的。

2015 年 1 月 26 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
二、核心概念	(4)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历史阶段	(11)
四、相关文献综述	(26)
五、研究方法	(33)
第一章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起源及发展	(37)
一、基督教传教士早期来华传教	(37)
二、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起源及发展概况	(43)
第二章 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背景分析	(57)
一、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客观背景分析	(57)
二、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主观背景分析	(74)
第三章 外籍校长与办学宗旨的确立	(91)
一、办学目的	(91)
二、办学方向	(104)
第四章 外籍校长的初期创校工作	(115)
一、联合办学	(115)
二、筹款与创校	(135)
第五章 外籍校长与师资队伍建设	(160)
一、完善师资梯队	(160)
二、提高教师待遇	(170)
第六章 外籍校长的学生观与对待学生运动	(176)
一、全面发展的学生观	(176)

二、对待学生运动的多种态度	(188)
第七章 外籍校长的专业和课程观	(199)
一、宗教一直是主要课程	(199)
二、丰富科学课程体系内容	(212)
三、发展世俗课程和职业课程	(222)
第八章 外籍校长的学校管理理念与方式	(239)
一、确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	(239)
二、塑造中西融合的校园文化	(245)
三、处理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264)
第九章 外籍校长的社会服务观及其实践	(287)
一、社会服务的出发点和理念	(287)
二、社会服务的种类和内容	(290)
第十章 外籍校长的办学影响及其评价	(300)
一、办学影响	(300)
二、评价	(311)
分析与结论	(323)
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45)

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中国近代的教会大学，是西方教会在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之后，顺势而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被很多学者认为带有“侵略”意味。但是，教会大学在古老帝国出现以后，国人对它的态度，始终是很矛盾的，行为上也是半推半就的。一方面，中国有着两千年悠久的儒学传统，侵略战争带来的亡国之痛，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高涨，对其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元素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教会大学所承载的西学，以及它本身的教育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了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抵制、冷眼旁观到主动欢迎和青睐，其态度在五十年中有了彻底的改变。教会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历史阶段，在国人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之中，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起来。而这些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贯穿在中国教会大学全过程之中，渗透在教会大学办学的各个主要的方面。

在文化领域，一方面，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儒学校一直是知识分子的首选学校，以科举为出身途径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教士办的学堂并不感兴趣，由此，在洋务运动之前的西方教会学校时常陷入找不到学生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以奕訢为首的主革新派积极推动中国建立起新式学堂，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西方创建的工商企业急需受过近代西式教育的人才，清

政府推动的留学教育和以美国为首推动的“庚款兴学”使得更多中国青年士子走出国门，见识到西方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西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发出学习西学以救亡图强的呼声，由此，西方传教士创建的教会学校和中国晚清政府创办的新式学堂越来越受到青年读书人的青睐，纷纷趋往。这推动教会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迈进了高等教育的门槛，一批或联合而成或独立创办的完全大学纷纷涌现，生源有了保证，经费日益充足，教会组织和办学人开始要求培养“基督教领袖”。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增至约4万名以上。增加的数量不算多，但层次更高了，中等学校占10%，很多学校在中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大学班级。大学生总数虽不到200人，但表明教会大学在逐渐形成之中。^①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外国教会已建立起一个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并包括各种专门教育的相互衔接的教会教育系统。据统计，1920年，全国基督教学校学生数为245049人，比1912年翻了一番；天主教学校学生数也有113690人。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大学的发展，1925年全国公立大学仅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也只有5所，而教会大学却有16所之多。^②到1930年，十三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完全大学和文理学院）的学生数为4335人，如加上医学院和神学院，则为4516人^③；而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统计，中华民国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高等教育学生数为44167人^④；可见，即使在30年代初，教会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仍约占中国大学生数的10%。

由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教会大学在数量上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到1920年，基督教高等教育已趋成熟。“它们的教育水准令人尊敬，而且大部分都不强调宗教信仰。它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②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③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④ 《丁编·教育统计》，选自《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9页。

们确立了新的教育模式和有价值的标准，以及很有帮助的范例。”^① 因此，不清教会大学发展的历程，不了解它们的办学特点，不足以反映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整体面貌。

然而，因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所有教会大学都被拆分关停，教会高等教育在中国土地上以强大的生命力生存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从此走入了历史。而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书的编撰者并没有给它们一个合适的位置和名分，不仅研究者寥寥，且评价偏颇，甚至是遭到了许多歪曲真相的恶意攻击。

近三十年来，许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距离，人们开始能冷静地思考这段历史；又因社会环境的宽松，学者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兴趣给调动了起来，对教会大学的研究日益频繁，成果也日益出台。怀着一种冷静淡定的态度，研究者开始解开教会大学及办学人的本来面目。

福建协和大学第三任中国籍校长杨昌栋曾把中国的教会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教士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人阶段，中国人握有实权的民族主义阶段和基督徒阶段，基督徒阶段指国际间和民族间完全的理解和彻底的团结一致。^② 而在高等教育界，以教会大学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并任命中国人校长的前后，也有着鲜明差异的两种办学风格和办学实践。在教会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卢茨认为“早期教会大学间的差别往往是校长的缘故^③”。而因史料的匮乏及对这段敏感历史的有意规避，研究者对教会大学的外籍校长研究甚少，即使在近二十年开始有所涉猎，但研究范畴仍狭窄，研究深度仍肤浅，更是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整体研究。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对教会大学的早期外国传教士校长们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出身背景、来华经历及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师生管理、校园风气的营造、专业课程的建设等方面的影

① [美] 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② [美] 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姜源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

③ [美] 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响有个全面的了解，并可依次做出自己的评判。

从实践上来看，这一传教士校长群体的治校模式与中国人治校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即使到现在，他们的一些做法仍对我们管理和治理大学有着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核心概念

首先，有必要对几个概念进行说明。

(一) 大学

中国之有“大学”名称，概自民国成立起始。之前的高等教育机构，被称为“高等学堂”，从其性质及课程设置来看，实为大学预科阶段，故民国成立的大学中，多将原有高等学堂设为大学预科。根据《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部令第17条）：“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① 1917年9月27日颁布的《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又对大学有补充修正说明：“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② 从这些法令的规定可知，大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学”，有两个要素：一、所设学科在两科以上；二、学习程度精深，教学与研究并重。对设立大学的学制并没有严格的限制。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第八条规定：“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大学院不设年限。”^③

①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② 同上，第381页。

③ 《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3年1月。又见《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转载自《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二) 基督教大学

从教会历史看，基督教与天主教原本是合一的教会，在历史上有二次大分裂：公元 1054 年，合一的教会分成两个教会：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史称希腊公教会或东正教；西方教会，史称拉丁公教会或罗马公教会。东西方教会在信仰根源上，可说完全相同，而在表达信仰及敬礼上，却有各自的特色；在教会行政上，各自分治，东正教由其首席教长以象征性领导，罗马公教会由教宗以实质性领导。为辨别这两个公教会，一般称希腊教会为东正教（Orthodox），称罗马公教会为 Catholic（中译：天主教）。东正教会因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最后灭亡，逐渐分化为 15 个相互独立的正教会即自主教会，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多元局面，并相继建立各成一体的牧首制，主要流传于东欧、俄罗斯等地。16 世纪从罗马公教会再分枝的基督教，主要有四个教派：（1）路德教派（信义宗 Lutheran Church，1517 年）；重洗派（Anabaptists，1534 年）；士文克特派（Schwenkfeldians，1539 年）；门诺会（Mennonites，1545 年）；（2）慈运理派（Zwinglianism，1523 年）；清教徒（Puritans，1559 年）；公理宗教会（Congregational，1581 年）；（3）圣公会（Anglican Church，1534 年）；（4）长老会（Presbyterian，1537 年）；加尔文派（Calvinism，1541 年）。以上各教派一般称为基督教。这四大教派可说是后来 400 多个基督教派的源流。所有这些宗派逐渐形成旧教、新教的对立，并形成基本定型的三大派系（天主教、正教、新教），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造成全球性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促成天主教会内部实行一些革新措施，并产生出新型修会耶稣会。罗马公教会在 16 世纪——明朝末年，由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位传道士（属耶稣会传教士）传到中国。他们在 1583 年把罗马公教会（Catholic Church）译为“天主教”，以别基督教在中国译用的“基督教”，18 世纪因“中国礼仪之争”而被清廷禁止。17 世纪末叶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开始在黑龙江流域建堂立院，随之亦在北京设立教堂。据统计，在 1917 年前，属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 37 座，神学院 1 所，男、女学校 20 所，气象台 1 座，图书馆、工厂等企事业机构 46 家，拥有教产 150 万卢布。1807 年，新教传教士马礼

逊到广州传教,为新教传入中国之始。^①东正教虽建有少数学校,但因其彰显的政治目的、传教士文化过低、脱离中国儒家文化、不愿学习中国语言、清规戒律过多、内部管理的混乱,加上对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没有予以注意和重视,中国人多半不感兴趣,因而难以开展传教活动,其发展的少数信徒也主要在俄侨中间进行。东正教会在中国没有开办更多的教会学校,培养中国化的接班人,因而难以扩大影响。^②相比较而言,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所建学校较多,直至发展成教会大学。本论文所说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教新教。

本论文经常出现的“差会”一词,是指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产生于17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展,逐渐向美洲殖民地和亚洲、非洲各地伸展。初期的差会,有些由殖民主义国家政府直接主持。19世纪以来,形式上多由教会办理,也有不从属于任何教会而独立组织者。^③差会要负责宣教士的生活费用,宣教士要对差会负责,向差会汇报工作情况。从19世纪中期起,美英等国的基督教国家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差会以组织传教活动。

什么样的大学是基督教大学?

1922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团长巴顿(Ernest. D. Burton)认为,基督教教育即“盖不在操权办理之团体,又不在办理人之宗教关系,又不在课程之科目,而实在于教育之精神与宗旨而已”。^④从此定义看,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所在不是其主办者、办学者、管理者的基督教性质,而在于其实施教育的精神与宗旨为基督教的。比如,岭南大学并不隶属于某一差会组织或联合差会组织,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基督教性质。

① 参考“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http://www.chinacath.org/article/guia/dayi/liaojie/2008-01-13/1425.html>;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344页;“中国东正教—圣网百科词库”,<http://zhsw.org/bk/index.php?doc-view-1868>。

② “东正教与中国文化—东正教—宗教频道—优网”,<http://www.21une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41&id=28316>。

③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④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页。

所以，基督教大学是指由基督教差会组织或基督徒创办、旨在按基督精神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办小学、中学，然后陆续地一直办到高等教育阶段。那么，从何时起这些学校可以被称为基督教大学呢？

一般现在的论著都认为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有 16 所教会大学，包括 13 所基督教大学和 3 所天主教大学，而不把之前的书院阶段（多数基督教大学的前身学校）认为是大学。之所以这样认定，原因之一是因为各基督教大学之前的书院阶段教学程度较浅，多数相当于中学程度，少数相当于大学预科阶段；另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基督教大学多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才在各办学教会组织的母国政府注册立案，也就是说：立案之后，其教会所属母国政府承认这些教会所办教育机构为大学程度的学校。故基督教大学的成立标志一是课程程度，二是法律身份。

各基督教大学在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纷纷联合办学，合并资源，扩大规模，并在各教会组织的母国政府立案，主要是考虑联合后可以更好地提高学校的质量，可以与当时中国大地上新兴的公立大学匹敌。同时也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促使外国各传教组织意识到传教力量的不足，纷纷想通过办学来提高传教士的数量和质量。另有部分教会组织独立创办高质量的完全大学。而在各母国政府注册立案，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本校毕业生可以为外国各学校认可，以便进一步进修研习，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对私立学校没有立案之说，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学位授予。

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于是，参加“中华教育会”的一些传教士，在 1902 年组织“中国政府请愿书准备委员会”，决定积极采取行动，获取清政府的承认，以便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前途。卜舫济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制度后，卜舫济还呼吁中国政府将授予官办学校的特权给予教会学校，“只要工作合格就予以官方承认”。只是争取中国清政府承认的要求，1906 年遭到了学部的拒绝。为此，“中国教育会”的编辑、圣约翰教师孟嘉德就评论说，此事“清楚表明，教会学校被视为帝国教育体系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刻尚未来到”。热情被浇灭之后，圣约翰不再寻求获得政府承认。所以，1911 年 10 月 11 日卜舫济致函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卫理（E. T. Williams），指出：“在一